

巴罗佐： 10年欧盟“掌门人”

7月15日，前卢森堡首相容克当选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现任主席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10年的欧盟经历，也将宣告结束。

2004年，巴罗佐从葡萄牙总理一跃成为拥有25个成员国欧盟的“大管家”。此后10年，他经历了欧盟制宪危机、欧债危机等重大事件，作为“救火队长”四处奔走，却还是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在民众疑欧、反欧情绪日益强烈的背景下，他不仅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还需要证明欧盟的未来。这个“掌门人”，还真不好当。



巴罗佐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当选：不仅仅是运气好

身为葡萄牙总理，巴罗佐在国内政坛顺风顺水。29岁即当选议员，36岁出任外长。1991年5月，经过他的调解，前葡属非洲殖民地安哥拉交战双方签订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16年的内战。2002年，46岁的巴罗佐成功当选葡萄牙总理。

两年后，巴罗佐出人意料地被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个结果是典型的政治博弈的产物——在欧盟这个需要20多个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的政治生

态下尤其甚。当时，法国和德国在人选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之下，巴罗佐以黑马姿态脱颖而出。他温和沉稳的个性，出色的外交履历和亲美立场，成为各国接受他的重要理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认为巴罗佐是一个有能力 and 善于对话的外交官，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认为他是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合适人选”。

在欧盟宣布决定的记者会上，巴罗佐向记者介绍自己的

经历时说：“这或许只是运气好，但欧洲确实需要好运气！”

事实可不只是“运气好”这么简单。在欧盟内部，任何决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能做到争议最小已属不易。在这里谁都不拥有绝对话语权，再大的国家也必须纵横捭阖，争取共识。

这也是巴罗佐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在复杂的决策系统中，最大程度地平衡各方利益和意见，干出点事来。

挑战：做所有欧洲人的主席

巴罗佐上任后的第一个挑战是“组班子”。2004年8月12日，巴罗佐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公布了欧盟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的组成名单，这一结果比媒体原先8月底的预计时间提前了不少。实际上“组阁”并不容易，欧委会相当于欧盟的国务院，负责欧盟的日常事务。作为常设的超国家机构，职位的安

排必须照顾到各方的利益诉求。

为此，巴罗佐特设了5个副主席，由法、德、意等欧盟大国担任，但其他重要岗位则由来自荷兰、奥地利等几个小国的委员出任。巴罗佐上任之际，恰逢欧盟经历了历史上最大一轮扩容，成员国由15个增加到25个，新一届欧委会成员人数也

从20名增加到25名。巴罗佐就将交通与能源、农业与渔业等职位一分为二，使所有的委员都能各有其司。

2004年11月1日，巴罗佐走马上任。他说：“我将成为所有欧洲人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从地中海到巴尔干，从欧盟创始国到新成员，从穷国到富国，从小国到大国。”

成就：做革新者不做革命者

挑战和蓝图一样巨大。2005年5月和6月，《欧盟宪法条约》先后遭到法国和荷兰全民公投否决而陷入僵局。为了解决制宪危机，巴罗佐闪电般斡旋于成员国和欧洲议会之间。2008年欧债危机发生后，为了促成向希腊和爱尔兰等国的援助，巴罗佐又来回穿梭在欧盟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间。

2007年12月13日，欧盟各国首脑签署了《里斯本条约》，

成为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新成果。被称为“欧盟临时宪法”的《里斯本条约》不仅带来了欧盟管理体制的变革，而且成为巴罗佐为下任留下的宝贵“遗产”：从2014年起，欧委会的委员人数将从27名减至18名，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将显著加强。

2010年5月，欧元区(IMF)联合提供给希腊1100亿欧元救助。同年12月，爱尔兰接受欧盟8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2010年9月，巴罗佐首次效

仿美国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指出未来一年欧盟将面临的挑战：继续应对经济危机，完善欧盟经济治理；加快经济改革，推进欧盟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欧洲2020战略，以恢复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和安全的欧盟；启动欧盟预算改革谈判；提高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巴罗佐曾评价自己：“我是革新者，不是革命者。”

尴尬：遥远的前瞻性规划

2012年9月12日，在“国情咨文”中，巴罗佐提出了今后欧盟的发展方向，即走向“民族国家联邦”的政治构想，并宣称欧洲需要一种“新思维”。这是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欧盟一体化进程面临严峻考验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试图为欧盟未来政治走向做出的重要前瞻性规划。

但高失业和低增长让欧盟

各国在经济方面还疲于应对，似乎无力顾及长远规划。而像英国首相卡梅伦等领导人，本来就对欧盟扩权不感冒，更不可能对此类强化欧盟权限的政治构想表示出任何兴趣。

巴罗佐还曾试图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级的能源管理机构 and 单一的欧洲能源调控机制，但几乎没有一个欧盟国家支持这个设想，几个大国都认

为各国应该具有制定独立能源政策的权力。尴尬的巴罗佐只得解释说，欧盟委员会此举并不是想扩大自身在能源领域的权力，也不想将欧盟委员会权威凌驾于各国能源政策之上。他说，他不想卷入“抢地盘的争斗”。

不过，新规划也好，“抢地盘”也罢，如今这些都交给接棒者容克去操心了。



纳丁·戈迪默

纳丁·戈迪默： 她到天堂为曼德拉 写演讲词去了

她看人的方式与众不同，即便是1991年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晚宴上也是如此。当时，身着端庄的深蓝色阿玛尼西装，坐在瑞典国王右侧的她，看上去十分警觉，就像是一只鸟，一只或许是受了惊吓的鸟，一只来自南非大草原，长着蓬松的灰色羽毛，两只眼睛一闪一闪的黑背蓬背鹑。

她，就是于7月13日去世的、南非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斗士。据戈迪默的家人称，她是在安静的睡梦中去世的，终年90岁。

本报特约编译 时钟

童年以书为伴

1923年11月20日，戈迪默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以东一个名叫“春天”的矿业小镇上。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片“被大火烧过的草原，四周到处都是煤渣，以及用煤渣堆起来的小山”。

1977年，戈迪默在开普敦大学发表题为《做一个南非人对我意味着什么》的演讲时说：“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愿景。这不是大多数欧洲人所承认的南非。但，这就是非洲。尽管荒凉丑陋，但是非洲以及非洲的景色，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它是身为一个南非人首先要了解的事实，我后来所看到和知道的全都基于此。”

从10岁起，戈迪默就离开了学校，由母亲来教育她。戈迪默的童年生活是孤独的。这是一种被无数的秘密和不可言说的渴望压抑着的生活，而唯一能让这种生活有生机的唯有“沉默寡言”。因此，书成了她的朋友。俄国作家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她了解了人类的天性；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填补了宗教信仰所不能填补的空虚；法国作家普罗斯特给她展示了作为青少年梦想中心的性饥渴，既有其令人愉悦的一面，也有其残酷的一面；爱尔兰诗人叶芝教会了她正义的激情。所有的这些作家和作品都促使她下定决心：不能像当时的南非人那样去观察周围，去看待社会。

与曼德拉结为挚友

即便是在南非国民党于1948年通过种族隔离法案之前，南非的黑人和白人受到的待遇也是不同的。就在黑人矿工只能站在栅栏后，用手指指向他们想要的购买商品时，戈迪默和她的母亲却能够走进商店，试穿15件衣服。后来，她在自己的小说中写道，这是令她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

20多岁的时候，她来到约翰内斯堡，并在百年名校金山大学读了一年书。一年的时间足以让她同一些黑人成为朋友。除此之外，她还结识了当时正在南非尼亚审判中为纳尔逊·曼德拉辩护的两名律师。她后来坦承，曼德拉在那次审判中所做的著名演讲——《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就是她为曼德拉起草的。从此，两人成了一生的朋友。在狱中，

曼德拉阅读了她的作品；在监狱外，戈迪默为冲破种族隔离制度奔走呼号，用她的笔，描写周围的生活，而她周围的生活就是种族歧视。戈迪默加入了当时还是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并同她的第二任丈夫——非洲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时任非国大主席的艾伯特·卢图利藏匿了一段时间。她的作品因此被南非当局列为禁书。她促成了南非作家协会的成立，并且还为此捐出了部分诺贝尔奖奖金。

诺贝尔奖不是墓碑花环

从15岁起，戈迪默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其首部小说《虚妄的日子》问世时，她还不到30岁。这部用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既没有情节，也没有结局。当时，除了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书迷之外，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做是一部小说。但是，戈迪默却通过女主人公海伦·萧的约翰内斯堡贫民窟之旅，展示了当时“那个爆炸性的大陆上，最具爆炸性一角的全景”。

1974年，她以《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得了当年的布克文学奖。

1979年，她写出了《博格的女儿》。

1981年，她的长篇小说《7月的人民》问世，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她最著名的小说。

1991年，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南非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第二位获奖的犹太作家，第七位获奖的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称赞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

2007年，当作为国际布克奖评委的她被问及，她在70多位作者那里寻找什么的时候，她快如闪电般地回答道：“启发”。“启发”，正是她在自己的小说中力求传达的那种东西，一种可以帮助人们相互直视的东西。

她说：“当我获得诺贝尔奖时，不想人们把这个奖项看作是我墓碑上的一个花环。”

她曾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审视罪行背后的原因。如今，南非还有很多年青人生活在没有机会的贫困之中。他们需要教育，需要培训，需要就业。”

身高只有1.55米的戈迪默，无疑是一个巨人。